

【编者按】

近日,东江流域博罗地区先秦时期聚落考古调查最新成果公布。此次博罗阳遗址的发掘工作,为深入研究岭南地区“中国化”进程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材料,这是考古人员首次在岭南地区冲积平原发现深埋地下2米的战国时期文化层,是岭南田野考古工作的重大突破。

作为千年古城,惠州地区在四五千年前已有人类活动。对于惠州,尤其是博罗人而言,发现古遗址已经司空见惯。近几十年来,博罗先后多次发现横岭山、梅花墩以及银岗等大量古遗址与墓葬群。专家指出,这为先秦时期岭南文化不逊色于中原文化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李海婵)

□李博 许玉崇 欧清威

为推动岭南早期文明的研究并实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演进格局,2024年以来,广东省惠州市和博罗县两级政府将“东江流域博罗地区先秦时期聚落考古调查”工作纳入政府工作报告。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惠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和博罗县人民政府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全面推动相关工作。2025年3月,在考古调查过程中,惠州市博罗县龙溪街道银岗村罗阳小组发现一处重要的先秦遗址有遭到破坏的严重风险,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立即组织实施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共计500平方米。

分布面积约2.5万平方米  
多方协同推进遗址抢救性考古

博罗县罗阳遗址位于惠州市博罗县龙溪街道银岗村罗阳小组,地处罗浮山南麓、东江北岸的沙河南岸,处于沙河与东江之间的冲积平原地带。

根据《博罗县志》记载,此处曾为博罗县南朝时旧治。唐贞观元年废,因而如今博罗县城与此处同称罗阳。该遗址的西侧为银河,连接沙河与东江,俗称“罗阳沥”或“马嘶河”。东南约1公里处分布有战国时期的银岗窑址群,西侧4公里处则为春秋时期的梅花墩窑址。

根据考古调查和发掘成果,罗阳遗址石龙头地点的年代与银岗窑址群一致,共同构成春秋战国时期的手工业与聚落复合体。

## 已探明罗阳遗址的核心区域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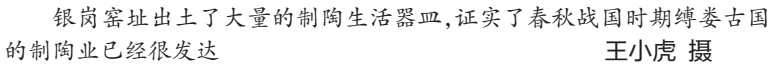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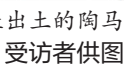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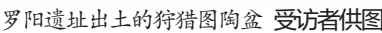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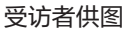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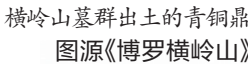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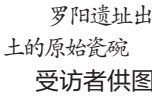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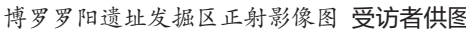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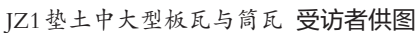
层分布面积约2.5万平方米。选取破坏风险最大、文化堆积最为丰富的石头岭地点作为重点发掘区域,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组织专业队伍,联合博罗县博物馆及相关科研机构共同组成考古工作队。面对台风频发、地下水位高、地层深厚等挑战,考古队创新采用了电动防护大棚,可电动关闭顶棚,并设置了完善的排水体系以保障发掘顺利进行。通过优化发掘方案并采用低成本且科学的排水与防护措施,使位于临河冲积平原、深达约2.5米的探方在连续台风及特大暴雨期间仍保持干燥无积水,确保了发掘作业的连续性与安全性,也为岭南地区深埋文化层的田野发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发掘出土文物标本850余件  
刻画图像描绘岭南先民狩猎生活

此次发掘的地层堆积序列清晰,文化层分布明确,自下而上可分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战国时期、宋代及明清现代四个时期,其中战国时期遗存最为丰富,与银岗窑址群分期基本对应。

遗址发掘出土文物标本850余件,陶片400余箱,种类繁多,主要包括陶器、原始瓷器、青铜器、铁器、石器、陶人像等,其中陶器最为丰富,包括罐、瓮、豆、釜、鼎、杯、钵、埙等遗物,纹饰以米字纹、方格纹为主,早期地层还发现了夔纹、蝉翼纹、云雷纹及勾连云雷纹等纹饰。发掘遗址194处,其中柱洞(坑)125处,墓葬2处,堆积4处,沟1处,灰坑25个,井1座,建筑基址1座,灶1处等。

在发掘深度约2.15米的层次上,考古队揭露出一处平面略呈“四”字形的大型台基式建筑基址JZ1。JZ1仅存大型台基,台基上建筑已被破坏,对其形制结构判断主要依据膏泥和灰砂的分布范围。基址大致呈东北—西南向,凹口朝向为基址北方,方向为52°。平面上发现有40个尺寸、形状各异的柱洞,8个柱坑,其中7个呈圆角方形或圆角长方形,还有一个为不规则形,排列组合规律均待研究;JZ1有两条东北—西南走向的沙沟槽,主体部分还有三条西北—东南走向的沟槽,基本平行,长短不一,可能



主体遗存为春秋晚期至战国  
实现岭南田野考古工作重大突破

此次发掘区位于博罗罗阳遗址的遗址核心区,未完整揭露建筑基址。遗址出土文物以陶片为主,包括泥质硬陶、夹砂陶等,其中陶片纹饰多样,如米字纹、方格纹、菱格凸点纹、夔纹、曲折纹、云雷纹等。结合出土器物的形态、地层堆积特征以及测年结果,遗址主体遗存年代判断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其中水井年代为战国晚期,建筑基址废弃年代为战国中晚期,始建年代不早于战国早期。建筑基址下的文化层年代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

博罗阳韶遗址的发掘工作,为深入研究岭南地区“中国化”进程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材料。首次在岭南地区冲积平原发现深埋地下2米的战国时期文化层,是岭南田野考古工作的重大突破;此次发掘工作发现了完整的战国时期水井、明确的建筑台基与高等级建筑构件,为探寻区域内高等级建筑提供了重要线索;这一重大发现为探讨岭南区域聚落形态、建筑制度及其融入中华文明、参与构建多元一体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进程提供了坚实的实物基础。

## 千年遗址星罗棋布 古县瑰宝闪耀新辉

羊城晚报记者 李海婵

巍巍罗浮山，悠悠东江水，作为广东四大文明古县之一，博罗文化底蕴深厚。罗阳葫芦岭遗址、铁场苏屋岗遗址、铁场何屋岗遗址、花溪银岗遗址、园洲梅花墩遗址、罗阳横岭山古墓群等星罗棋布，充分展示了以博罗为中心的东江中下游区域四五千年以来的人类文明。

在这片土地上,最晚四五千年之前,就有先人聚居劳作、生息繁衍,葫芦岭就是重要见证。作为一处新石器晚期贝丘遗址,葫芦岭东西约150米,南北约50米,高约60米,从岭顶到岭脚被厚厚一层灰白色沙螺蚌类贝壳所覆盖,表明了生活于此的先民部落规模颇大,并且聚居时间较长。此外,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的石斧、石码、石铎等石器,以及夹砂黑陶、印纹硬灰陶等陶片,可见当地社会文明发展到了一定程度。

横岭山墓葬群的重大发现更是震惊了考古学界。2000年,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博罗县横岭山发掘商周时期墓葬300余座。墓葬群除出土了大量的陶器、原始瓷器、青铜器、玉石器等,陪葬品中罕有地出现了水晶,以及象征权力地位的铜甬钟和青銅鼎。

这不仅对惠州研究先秦历史文化意义重大,也是广东省发掘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青铜时代墓葬群。著名考古学家·广州博物馆名誉馆长麦英豪等均推断,缚娄国的核心所在地可能就在附近。青铜鼎等贵族之器的出土,更是强有力地说明了岭南并非野蛮之地,改写了岭南文明史,从而使经过考古认证的岭南文明史得以上溯到3000多年前。

与罗阳遗址石龙头地点的年代一致、距离相近的银岗窑址,位于博罗县龙溪镇银岗村,始烧于西周,延续至战国晚期,历时数百年,占地面积约10万平方米。出土有青铜工具、原始瓷器和以夔纹或米字纹为主要装饰特征的陶器,推断出“夔纹陶类遗址”早于“米字纹陶类遗址存在”,解决了几十年来考古界的学术争议。

银岗窑生产的陶器,在周边地区亦有发现。如在粤东、粤中、粤北甚至在深圳、香港等地的遗址或墓葬中出土的陶

器与银岗窑址的陶器也属同一类型。这说明春秋战国时期惠州已有较高的制陶技术,生产的陶瓷不仅在当地销售,还利用东江水网作为运输渠道销往各地。

银岗窑址是广东省迄今所发现的跨越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先秦时期的龙窑窑址,为研究先秦时期东江流域乃至整个岭南地区制陶业和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提供了珍贵的实物材料。

从银岗遗址驱车不过10分钟,便到了梅花墩窑址。梅花墩窑址位于园洲镇田头村(梅花墩),属春秋时期,分布范围约10000平方米。窑址中出土遗物较丰富,有生产工具、生活用器、动物模型等。其中泥质硬陶占多数,还有一些原始瓷和釉陶,夹砂陶等。

出土陶器有罐、簋、盂、盘、釜和陶塑牛、羊、鹿、鸡、鸟等,还有陶压锤、夔纹印模。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少量红陶和夹砂陶;纹饰以夔纹为主,其他有曲纹、云雷纹、重圈纹、菱形纹、篦点纹、水波纹、弦纹等。此外,还出土了原始瓷豆,胎灰白色,质坚硬。

梅花墩窑址意义重大,是广东省内最早发现和发掘的一座龙窑,该窑的发现将广东龙窑历史提前到两千多年以前,为研究陶瓷工艺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博罗遍地是宝,传承创新并非易事。“这些宝贝不应该只是放在博物馆、也不是书本,而是需要鲜活地呈现出来。”此前,记者采访华南理工大学旅游发展与规划研究院院长、教授吴志才,他认为,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是最根本的理念。同时,将遗址保护纳入当地的法律法规,立法保护文化。解决好理念、立法两大问题后,创新文旅融合,开展“四化”活动,即有形化、项目化、活动化、产业化。

无独有偶。“博罗有如此深厚的文化资源,为何不在硬件设施上多下功夫?”惠州民俗专家林慧文曾建议,博罗利用好梅花墩春秋窑址、银岗春秋战国窑址等先秦遗址,组建专题调研策划团队,打造文化主题博物馆、文化公园,并设为文化教育基地,“让新一代人对博罗历史文化有更深体会”。

